

黎智英團隊不斷橫生枝節打什麼算盤？

銳評
卓偉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干犯香港國安法案續審。目前有三個重點值得關注：

一是控方披露黎智英在8年間，曾轉賬1.18億元給Mark Simon，而對方收錢後很快便會將大部分款項，分給「支聯會」、民主黨等所謂「泛民」政黨及政治人物，執法人員認為黎是利用Mark Simon賬戶來作可疑目的。而黎旗下的加拿大公司亦曾轉賬公黨黨、「社民連」等約2000萬元。這說明了黎智英與「泛民」之間的聯繫。一個自稱的「普通的出版商」，卻以巨額資金資助「泛民」政黨，並將其操控的傳媒作為這些政黨的宣傳喉舌，這已經表明雙方非一般的關係。

與外國政客的關係是重點

二是黎智英與外國政客的合作關係，黎智英曾在2013年至2017年間，分6次轉賬逾176萬元給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沃夫維茲；美國企業研究所逾11萬元；分兩次轉賬逾350萬元給陳日君；轉賬20萬元予英

國組織「香港監察」。另外，黎控制的香港公司力高顧問有限公司，亦有轉賬2萬歐元至意大利媒體公司RCS MediaGroup S.p.A。即是說，其與外國政客的關係，絕不只是早前案情披露的設立通訊群組密切溝通，甚至定期匯報那麼簡單，而是彼此有金錢關係，這樣的金錢與合作關係，是否涉及勾結外國勢力，將是此案一個重點。

三是涉嫌主導海外亂港組織「重光團隊」，建立國際網絡、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平台。而據控方所指，黎智英是「金主」和主腦，不但提供資金，還在台北住所會見團隊核心成員。這可以說是對黎案最有力的指控，原因是「重光團隊」的本質十分明確，就是一個亂港組織，不斷到國際社會尋求制裁香港，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

據案情揭露，黎智英與律師助理陳梓華、李宇軒，一直管理「重光團隊」並以此作為平台，採取不同方法危害國安，他更親自部署四大步驟及三條「國際線」，請求外國勢力制裁中國和香港特區及介入修例風波。「重光團隊」在黎智英指示下，

四處接觸外國政客擴大網絡，並發表大量文章，請求外國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採取制裁和敵對行動。在2019至2020年，黎智英更多次資助「重光團隊」到英美日遊說制裁。已認罪的被告李宇軒，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員，過去曾收到3次巨額轉賬，合共涉款超過1200萬元。即是說，如果證實黎智英是「重光團隊」的「金主」及主腦，其勾結外國勢力罪名就有定罪可能。

控方現時主要是通過多名「從犯證人」的證供來證明黎智英屬本案主腦，李宇軒很可能是其中一名主要證人。面對大量的往來通訊、金錢往來以及「從犯證人」的證據，黎智英一方卻沒有就有關證據進行辯護，反而繼續大打拖字訣。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竟因突發原因，表示要缺席聆訊兩周，辯方又聯合申請在處理案件的承認事實後播放一些影片，預計需時四天半至六天。

以拖待變尋求外國施壓

在黎智英案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相關的代表律師卻在爭論案情以外的地方動

作不斷，一時又上訴，一時又要請假，接着又播放影片又各種程序爭拗，難免令人懷疑是有意拖延。原因何在？就是以拖待變。

一是要將訴訟拖長來打，不能太快結案，只有將案件不斷發酵，不斷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才能迫使更多外國勢力介入施壓。始終，黎智英案的資料文件浩如煙海，但案情並不複雜，只有將訴訟延長，才有時間以爭取西方介入，把水搞混，干預司法判決。

二是要想方設法推翻李宇軒等人的證供。李宇軒等「從犯證人」是第一身參與有關勾結外國勢力的行動，其證供將可直接指證黎智英的罪行。為了推翻這些人的證供，黎智英「國際律師團」日前又出招，向聯合國提出緊急申訴，對黎智英案主控方證人李宇軒的「遭遇及其對黎智英案的影響表示擔憂」云云，其目的就是想將有關證供抹黑成在「嚴刑逼供」下得來，不應作為呈堂證供。

然而，有關指控卻沒有提出絲毫證據，這個所謂的國際律師團隊沒有拿到任何影

片、照片，沒有任何證人供詞，就一口咬定李宇軒一定曾受到嚴刑逼供，造謠其證詞不可靠云云。身為律師團隊，竟然可以在毫無證據下作出如此嚴重的指控，所有劇情都是捕風捉影，全憑「腦補」，根本就是一場政治鬧劇，目的不過是通過向聯合國申訴，搞出一場「大龍鳳」，從而質疑以至否定李宇軒的證供。

有關做法之後也可以套用在其他「從犯證人」上，總之誰人指證黎智英，誰的證供對案件不利，就聲稱有關證供是遭受嚴刑逼供而來，其證供就不能用。

黎智英案開審至今，枝節不斷。不得不令人質疑，有人根本不是在辯護，也不是以證據自清，而是通過各種司法程序，以至利用外國勢力的政治施壓，尋求脫罪。也無法不令人質疑，有人是否拿不出有力證據自證清白？甚至反駁不了控方提出的理據和指控？勾結外國勢力罪其實十分清晰，並沒有灰色地帶，香港國安法沒有死角，不論是司法戰、拖延戰、造謠戰，以至西方國家的干預，都敵不過天理昭昭，法網恢恢。

資深評論員

呼籲外國制裁已違國安法



靜思明路
湯家驊

黎智英被控危害國家安全案件終於開審。一如所料，西方政客和媒體隨即異口同聲攻擊抹黑檢控及審訊是所謂「政治迫害」。英國外交大臣衛·卡梅倫更聲稱香港國安法對香港人的「自由」設下不合理限制，「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云云。就此我們不禁要問，公然呼籲外國對自己的國家或地區實施制裁，是一種合理的「自由」，還是一種應當受到刑罰之威脅國家安全行為？

英國安法禁止外國干預

就以上問題，我們不妨參考英國去年頒布的最新《國家安全法》中的「破壞罪」(Sabotage)和「外國干預罪」(Foreign Interference)。

英國《國家安全法》第十二條規定，任何人，無論在英國本土或任何境外其他地方從事行為導致或意圖對任何「資產」造成損害，而該損害「對英國國家安全或利益造成不利」影響，且符合「外國條件」，則該人將干犯「破壞罪」，刑罰可致終身監禁。法例並規定「資產」定義包括有形和無形資產，並涵蓋電子系統和資訊發布；而「損害」則包括干預「資產」的使用，破壞其功能或效能。在法例下，國家經濟利益毋庸置疑是一種不容破壞之「資產」。

該法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外國條件」是指某些得到「外國勢力合作或同意之下進行」的行為；而「外國勢力」則包括外國政府首腦或外國政府。

由此可見，如果有人公開且持續地呼籲外國對其本國實施制裁，甚至親自前往外國進行此類活動，損害本國經濟利益，該人很可能已觸犯了英國《國家安全法》下之「破壞罪」。

至於「外國干預罪」，該法例第十三條規定，任何人不論在英國境內或境外從事或意圖作出有「干

預成效」的「被禁止行為」，且符合「外國條件」，則構成「外國干預罪」。

「被禁止行為」在第十五條下包括但不限於「造成或威脅造成任何經濟損失」或「對某人造成精神傷害或施加精神壓力」的行為。明顯地呼籲外國對個別官員或法官實施制裁威嚇他們均屬該法例下所言之「被禁止行為」。第十五條進一步指出，任何明示或暗示之「錯誤陳述」亦可構成「被禁止行為」。

因此，西方政客將香港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說成「送中條例」，無疑是「錯誤陳述」，類似情況若在英國發生，該行為明顯地可構成英國《國家安全法》下的「被禁止行為」。

根據該法例第十四條規定，「干預成效」被定義為「影響任何人行使其公共職能」，或「干預在行使公共職能過程中提供之服務」，從而「損害英國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行為。因此，呼籲外國對政府官員或法官實施制裁藉以影響他們行使公共職能，或干預他們執行公職毫無疑問符合法例下所言具「干預成效」之行為。

經濟制裁屬於敵對行為

最後，這種行為當然也會損害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亦因此而構成有「干預成效」之行為。由此可見，任何人呼籲別國制裁本地官員或法官，無論在香港或英國均不可接受，亦會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而觸犯刑事條例。

放眼天下，今天之國際衝突已不再局限於武裝衝突。單看美國慣常地對別國實施制裁，打壓持不同意見人士的經濟也屬於經濟制裁的一種，經濟制裁甚至可以是威脅一個國家生存的敵對行為，我們亦因此絕對不能小看經濟制裁之危害性。正是如此，英國政客將香港特區法官依法審訊公開乞求別國制裁香港特區和特區官員的嫌疑犯這一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之舉措，抹黑為所謂「政治迫害」，根本是試圖以「雙重標準」干預香港事務、破壞香港法治的卑劣行為。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資深大律師

為破解世界重大挑戰提供中國方案

議論風生
鄭岩

2023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指出，針對當今世界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重大挑戰，我們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這一具有開創性、引領性意義的理念主張，為遭遇橫風逆流的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指明了發展方向，為破解當今世界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和挑戰提供了中國方案，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堅實依託。

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彰顯習近平外交思想胸懷寰宇、心繫人類進步事業的崇高世界情懷和重大時代貢獻。冷戰以降，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日益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習近平外交思想立意於世界發展和人類進步的道義制高點，深刻洞察世界歷史大勢發展潮流，主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戰、共同責任把各國前途命運聯繫起來，構建起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讓各國各地區都能在平等有序的全球多極體系中錨定一席之地，都能在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中實現互利共贏。這一系列世界性、普適性、開創性的理論創新，廣泛代表國際社會大多數，打破了少數國家對國際規則制定權話語權的壟斷，為國際政治文明進步帶來了新啟迪，也為國際社會長治久安、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向。

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昭示中國將為世界和平發展持續貢獻確定性、穩定性和正能量。當今世界多極化動盪失穩，經濟全球化前景堪憂，重要原因在於少數國家政治上抱持「西方中心論」，經濟上鼓吹「華盛頓共識」，甚至為亂中謀利，不惜誘引「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頻頻發生。

當人類社會來到可能通往大變、大爭、大亂的十字路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不走殖民掠奪的老路，不走國強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發展的人間正道。既造福中國人民，又促進世界

共同發展。

回首筚路藍縷，中國通過深度參與和融入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浪潮，用短短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示範，將持續激發廣大發展中國家「向東方看」「向中國學」，競相邁向和平發展道路。隨着國家繼續穩步進入現代化，中國還將持續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注入更多確定性，為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帶來更多發展正能量。

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是新時代中國外交奮進壯闊征程的重要遵循和行動指南。

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但人類發展進步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世界歷史曲折前進的大邏輯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命運與共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歷史自信。

展望未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進入一個可以更有作為的新階段。新時代新征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將以更加積極主動的歷史擔當、更加富有活力的創造精神，積極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切實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多極化進程總體穩定和具有建設性，推動各國共同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共同堅持普遍認同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順應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要求，推動解決好資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國家間和各國內部發展失衡問題。堅決反對逆全球化、泛安全化，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堅定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破解阻礙世界經濟健康發展的結構性難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發展。繼續高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引領時代的光輝旗幟，聚力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為扎實穩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美對華輿論戰認知戰一再失效



國際觀察
宋魯鄺

美國無法接受在正常競爭中落後於中國，因此以各種非市場、非國際法的手段進行遏制，這其中也包括輿論戰。2022年國務卿布林肯又給中國扣上一個新帽子：中國是唯一有意願和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國家。他畢竟是外交官，說的略嫌委婉，但含意世界都明白：誣指中國在挑戰國際秩序。

但事實卻是中國並無意願挑戰國際秩序，挑戰的恰是美國自己。

財力影響力每況愈下

第一，冷戰後影響或者挑戰國際秩序的事件已經不斷發生，但和中國毫無關係，儘管有些客觀上對中國的發展有利。比如第一次海灣戰爭、東南亞經濟危機、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九一一事件、美國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俄烏衝突、巴以衝突。從純客觀效果來講，中國不需要做什麼，這些不利西方的事件就發生了。

之所以如此，一是全球正處於大變動時期，出現這些事件是不可避免的。二是經濟實力衰退導致歐美主導世界的的能力明顯下降。2000年，西方GDP佔世界的比重是70%，現在則只有49%，權力是跟着財富走的，歐美在「財」不能支的情況下戰略失誤頻頻，經常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比如法國不顧周邊國家不能生戰生亂的地緣政治規律，一意孤行非要推翻利比亞卡扎菲政府，結果導致二戰後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以及伊斯蘭國的崛起，也成為英國脫歐的導火索。三是歐美內部治理能力也在下降，民粹主義崛起、政治極端化。由於歐美對世界的影響力，它們的內部事件往往影響國際秩序。比如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

第二，中國文明長於戰略，一直避免主動介入他國事務。比如一戰、二戰和冷戰都屬「勝利主義」的只有美國、英國和中國。雖然這三戰發生的期間，中國國力稱不上非常強，但中國戰略水平高，所以可以取得少數國家達到的成果。

歷史上中國最缺乏的，其實是外交戰術層面的經驗。原因就在於中國幾千年都沒有外交。我們在東亞一國獨大，我們的角色就是調解和仲裁，並不需要外交。直

到1861年中國才有了現代意義的外交機構。不像歐洲，幾百年打來打去，在權力平衡中爭來鬥去，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外交經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也很少主動出手改變或影響世界格局。中美冷戰時由敵變友是少見的個案。類似於九一一事件、「阿拉伯之春」等能改變中國外部環境和衝擊全球國際秩序的事件，都和中國無關。當然從歷史上看，中國一直都不願意捲入外部世界的紛爭，「王者不治夷狄」的理念，就是這個現實的反映，並不是僅僅今天如此。

第三，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而且又被美國視為頭號競爭對手，全球特別是西方是拿放大鏡以非常嚴苛的標準來看待中國。同樣的事，其他國家做了沒事，中國做了就不行。比如印度買俄羅斯的石油和武器，歐美視而不見，但對中國就橫加指責。很多國家對俄烏的立場和中國近似，但只有中國被指責。孔子學院，過去是正常的文化交流，但現在就被污蔑為影響西方國家內政的工具。復旦大學在匈牙利辦分校，消息一傳出就引發歐盟的強烈反對，其理由不外是中國會利用它來影響歐洲云云。也就是說孔子學院和大學辦分校這樣文化交流層面的事情，西方都不能接受，更別說中國現在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

自然就被視為「主動出手挑戰國際秩序」了。

另外，中國和西方的關係特別是經濟交織在一起，西方有很多手段對付中國。在今天的世界，即使中國沒做什麼，西方也總是捕風捉影地攻擊中國，比如澳洲、加拿大一再誣譏中國干預其選舉，影響特定政治人物的選舉結果。所以在這樣的大氛圍下，中國處理國際關係需要十分的謹慎。

第四，以美國為鑒，它在崛起過程中也是不挑戰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成為霸主前，著名的外交政策主要有兩個：一是門戶開放政策；二是門羅主義。一個要求利益均沾，一個要求歐洲不干涉自己的勢力範圍，同時美國也不會主動去挑戰歐洲列強。在門羅主義之下，美國外交上世紀比較突出的舉措是斡旋俄日戰爭，這也是符合歐洲列強利益的。它加入一戰和二戰也是在歐洲的強烈強求下，而不是自己主動介入。

中國今天崛起的環境要比當年美國惡劣，美國尚且如此，中國更是加以借鑒它的經驗。

當然，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也表明，中國是現今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因此美國

也長期指責中國「搭便車」。但不管從哪個方面看，中國完全沒有意願去挑戰這個國際秩序。

霸權行徑破壞國際秩序

反觀美國，它卻是真正的既有動機、也有能力，而且事實上也在挑戰和破壞着今天的國際秩序。首先是美國認為當今國際秩序更有利於中國的發展，最終會導致自己喪失霸主地位。美國的遏制根本不是因為所謂中國挑戰國際秩序，恰是因為中國在當今國際秩序下成功的發展。所以美國的單邊主義、反自由貿易、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崛起、癱瘓世貿組織等行為就在這個背景下——上演。

其次是冷戰後美國的霸權行為往往成為各種「黑天鵝」事件的催化劑，甚至是真正的始作俑者。比如美國偏袒以色列和干預阿拉伯國家事務、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就與恐怖主義氾濫、「阿拉伯之春」密不可分。

總之，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因素，美國才是今天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破壞者，要為日益混亂失序的世界負責。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